

齐鲁历史文化丛书

左丘明与《左传》

张汉东 邢子民 著

山东文艺出版社

目 录

一	春秋前的“史学传统”	员
二	史学大师左丘明	圆
	(一) 遥远的贵族家世	圆
	(二) “君子”美誉的史官生涯	苑
	(三) 昌盛的子孙后裔	苑
	(四) 歧说众多的左丘明研究	猿
三	《左传》记载的主要历史内容	源
	(一) 鲁隐公即位,《左传》记事开始	源
	(二) 齐国兴盛,桓公称霸	源
	(三) 秦、晋并起,晋成霸业	缘
	(四) 楚国崛起,庄王称雄	源
	(五) 晋、楚相争,弭兵中原	源
	(六) 晋、楚衰落,吴、越争雄	缘
四	《左传》的思想体系	苑
	(一) 轻天重民思想	苑
	(二) 礼治观念	苑



	(三) “天人合一”的社会观	愿
	(四) 丰富的军事思想	愿
	(五) 文学观与审美观	愿
五	《左传》的文学成就	愿
	(一) 生动鲜明的人物形象	愿
	(二) 神来之笔的战争描写	愿
	(三) 语言的艺术运用	愿
六	《左传》的史学价值	愿
	(一) 史学理论的初步提出	愿
	(二) 史料处理的成功探索	愿
	(三) 《左传》的史学地位	愿
七	《左传》的流传与研究	愿
	(一) 经今古文学之争与汉魏《左传》学的 创立	愿
	(二) 晋代杜预的《春秋经传集解》	愿
	(三) 唐宋时期的《左传》研究	愿
	(四) 清朝《左传》学的繁荣和发展	愿

一 春秋前的“史学传统”

中华民族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就史学来说，史学传统源远流长，早在春秋之前就经历了一个相当漫长的孕育时代，到春秋末期左丘明编著《左传》和《国语》，中国古代史学便标志性地产生了。

中国古代史学的孕育，最早可以上溯到原始社会的口头传说和原始记事。原始社会在其缓慢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出现一些远古传说，形成了朦胧的历史意识，并产生了具有一定历史内容的原始记事。这些远古传说和原始记事，是我国史学产生的原始要素。

远古传说主要表现为神话传说、始祖传说和英雄传说。神话传说是人们在长期的生产活动中，逐渐对自然界形成模糊认识，以幻想和神秘的形式来解释自然现象而产生的，其中寄托了人们征服自然的天真愿望，如女娲补天、后羿射日、夸父造林等都是这类神话传说；始祖传说追述人类始祖的诞生和系列奇迹，歌颂他们的伟大功业，是对氏族成员繁衍和劳动经验



传承的口头记录，如伏羲兄妹相婚、稷教民播种五谷等都是这类始祖传说；英雄传说表扬英雄人物，他们或是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做出了有益贡献，或是为保护本部族利益进行了卓越斗争，从而受到尊敬，成为人们崇拜的英雄，并在世代流传的过程中被丰满了英雄形象，如神农尝百草、黄帝战蚩尤、大禹治水等都是这类的英雄传说。这些神话传说、始祖传说以及英雄传说，往往故事奇异，事迹感人，是经过一代代人的口耳相传保留下来的，尽管其中带有一定的神秘色彩，但也保留了对当时社会状况的真实记录。这些记录涉及了当时社会的许多方面，如原始的农业生产、畜牧业生产以及人类与自然灾害的斗争，原始的社会习俗、制度，氏族、部落间的社会关系等等，为研究原始社会的基本状况提供了宝贵的参考资料。

原始记事是在氏族社会的进一步发展过程中形成的。随着氏族社会的逐步发展与进步，氏族部落成员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社会交往逐渐增多，人们单靠大脑的记忆，已经不能满足生产、生活的需要，因而便自然地产生了凭借一定的记事手段来巩固记忆的要求，于是原始记事便应运而生。原始记事一般选取简单而形象的图形，用结绳、契刻、图画等形式来记录生活中的重要事件。我国古书上所谓“结绳记事”、“结绳为治”、“结绳之政”，就是说的这种原始的记事时代。人们在长期的记事实践中，随着思维能力的提

高，记事范围逐渐扩大。起初记事的范围主要限于记忆个人及本氏族成员间的大事，后来便推广到记录氏族、部落或部落联盟间的有关事务，于是有些记录便逐渐有了历史记事的性质。历史记事的出现，是原始记事发展的重要阶段，也是文字记录历史的前奏。

文字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也是社会进入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志。文字的出现是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是在原始符号记事的基础上，在人们长期的生产活动与社会交往中逐渐产生的。中国文字的渊源非常久远，很早就有仓颉造字的传说，但没人了解它的源头究竟在哪里，只知道到商朝时中国的文字已经相当成熟。从殷墟甲骨文看，那时的文字主要掌握在巫、史手中。在古代，巫主要职掌占卜祈祷等宗教事务，史则是从巫中分化出来的文职官员。史官主要职掌记录国事，整理文书，起草诏令，以及歌功颂德、告示子孙等文事活动。中国的史官产生较早，传说在黄帝时就有仓颉、沮涌、大挠、隶首、容成、史皇等许多史官。一般认为夏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它曾建立了初具规模的国家机器，设置了各种官吏，史官就是其中的一种。夏朝的史官肩负起草文书、记录国事、管理档案等职责。商朝注重卜筮，每有大事都要卜问上帝，所以商朝史官除了肩负一般的文职，还作为神权的代理人，在社会政治生活中享有很高的地位，甚至能够直接左右商王的行动，对国家政权的



实施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西周继承和发展了商代的史官制度。西周王室的史官名称繁多，有史、太史、内史、中史、作册、作册内史、作命内史、尹氏、册氏、作册尹、内史尹等等。其中太史和内史最为重要。当时不仅王室设置史官，一些重要的诸侯国也有自己的史官，可见史官的设置在西周时期普遍受到重视。西周统治层的官僚队伍主要有两个系统，即职掌文职事务的太史队伍和职掌军政事务的卿士队伍。太史是史官之首，是文职官员的高级职务，有时可与太师、太保具有同等的重要地位，周初就有太史尹氏协助周王处理政务，长期受到特殊待遇的记录。西周史官除了继续从事观察星象、占卜祸乱、祈祷祭祀等活动外，更重要的则是起草诏令、传达王命、记录时政以及劝善规过。特别是史官的规劝君王、扬善戒过的作用，为后世史家所继承和发扬。

随着文字的产生和史官的出现，逐渐有了记录历史内容的文献。春秋时期，孔子为了研究夏朝文化，曾经亲自前往古杞国作实地考察，在那里找到了夏朝的历书《夏时》。另外，先秦文献中也有一些关于夏朝历书的零星记载。历书属于史官职掌，孔子找到《夏时》以及古书中关于夏历的记载，都说明早在夏朝时期中国的史官就已经写出了历书之类的文献。商朝的历史记载比夏朝要进步得多，特别是盘庚迁殷以后，不仅规模可观，并且达到了相当的水平，这在殷

墟甲骨卜辞中有充分反映。甲骨卜辞是关于占卜的记录，由于占卜在殷商社会生活中起有重要作用，所以卜辞内容涉及当时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从而也就具有了历史的性质。如有的卜辞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关系和阶级矛盾，有的记载了农业、畜牧、渔猎等经济生产状况，有的则记述了殷王的政治生活及各种祭祀活动。另外，殷墟甲骨文在记录的形式上也具有了一定的规格与程式，对后代的历史记事与史学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甲骨卜辞是目前所发现的我国最早的文字内容比较完备的出土记载，为研究殷商的社会历史提供了极为宝贵的可靠资料。金文也是早期历史记事的重要形式。金文，就是铸在青铜器上的文字。它出现于商代后期，西周时得到了充分的发展。西周金文的篇幅一般都比较长，内容很丰富，凡是关于赐命、表功、赏罚、征讨、祭祀、典礼、书契券约等活动均有记述，其中有的还特别详细。西周的金文记载，对西周史的研究有着极为重要的价值，它不仅印证和补充文献记载的不足，纠正古籍的讹误，而且还提供了许多珍贵而可靠的原始研究资料。同甲骨文相比，金文的记述形式有了明显的进步。它能巧妙地处理好记言与记事的关系，有的以记言为主，有的以记事为主，有的既记言又记事。金文作为一种历史记载，已经有了明确的著述目的与意识，可以看做是一种史书的雏形。金文之外，西周的历史记载还出现了内容完



整、篇幅更长的记述文章，这些文章主要保存在《诗》、《尚书》、《逸周书》等书籍中。《尚书》又称《书》，原义为上古之书，上通尚，所以叫《尚书》。《尚书》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历史资料集，主要是由一些古老的政治文件汇编而成。《尚书》的篇章有“古文”和“今文”之分。一般学者认为，现在传世的纡多篇《尚书》，其中有“古文”纡多篇是后人假作的伪书，而“今文”纡多篇则是先秦古籍。在这 纡多篇中，以《商书》中的《盘庚》最早，《盘庚》记载了殷王盘庚迁都前后的三次讲话，着重说明了迁般的原因及其对臣下的要求，从它的内容和语言特色来分析，可以断定是一篇殷代的政治历史文献。《周书》中的大部分篇章，也基本上可信是在西周编写而成的，它从多方面反映了周王朝建立和巩固的历史进程及其主要活动，是现在研究西周历史的基本史料。《诗》是我国最早的诗歌集，共有 纡多篇，又称“诗三百”，后来被汉儒尊为经，称为《诗经》。《诗经》由《风》、《雅》、《颂》三部分组成。《风》即 纡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民歌，共有 纡多篇；《雅》包括《大雅》和《小雅》，共 纡多篇；《颂》包括《周颂》、《鲁颂》、《商颂》，共 纡多篇。《诗经》中收录的诗歌在创作年代上有先有后，最早的诗歌起于西周初年，最晚的可到春秋中叶，前后持续共约 纡多多年。其中形成于西周时期的，主要有《大雅》中的 纡多篇，《小雅》

中的 苑篇和《周颂》中的 猗篇。这些诗多采用现实主义手法，表现了西周时期的一些重要社会内容。《大雅》所选的诗歌，形象地记录了周王朝兴建、强盛及其衰落的历史过程。《小雅》中的诗歌则主要记录了西周时期的一些农事生产，不仅反映了当时的农业经济状况和社会生产力水平，而且还揭示了西周的 土地制度、社会结构及阶级关系等深层社会问题。所以，《诗》中收录的许多诗篇，可以看做是价值珍贵的史诗，影响了后世史书中论赞体式的形成。《逸周书》原名《周书》，因为它所记载的内容不见于《尚书》中的《周书》，因此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称它为《逸周书》，并沿用下来。该书收录文章 苑篇，其中 猗篇只存书目，实际上只有 猗篇。《逸周书》所录内容上起周初的文王、武王，下迄春秋后期的灵王、景王，时间跨度很大，但主要叙述西周初期的史事。经学者辨别，书中的部分篇章应该是西周文献，对研究西周历史具有重要价值。上述典籍篇章，都是记录历史内容的文献，并且多是经史官之手长期删定整理而逐渐形成的。

我国先民很早就对人类社会的发展有了朦胧的认识，学者把这种朦胧的认识称之为神意史观。神意史观来源于原始社会的宗教迷信思想。远古时期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人们将无法理解和改变的现象归结为上帝鬼神的安排，并对鬼神充满盲目的迷信和崇拜，



从而形成神的意志主导人类社会活动的观念，这就是神意史观。直到殷商时期，人们还特别尊崇和敬畏鬼神。在殷人看来，上帝是凌驾一切的至上权威，是自然和社会的最高主宰，国家兴衰、社会治乱、政事成败、战争胜负、年景丰歉、个人祸福等等，一切都取决于上帝的意志，都是上帝在冥冥中的安排，连殷王朝的建立也是上帝的旨意，殷王就是上帝的儿子，是上帝派来统治民众的，死后还会回到上帝身边，所以，殷人不论做什么事情，都要卜问上帝，乞求上帝的旨意和庇护，始终坚持神的意志操纵社会历史、人类活动不能违背神意的信条。商朝的灭亡，使周人对天命产生怀疑，逐渐认识到了“天命靡常”的道理。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周人提出“敬天保民”的思想，在敬天的同时更加注重人事。周人认为，民心和天意是相通的，得了民心，也就通了天意，因此只有有效地采取措施，得到人民的支持，才能永享天命，保住自己的统治地位，而不至于重蹈殷商灭亡的覆辙。周人的这一思想，把社会历史由神意的单一操纵改换为人神共同支配，并且尤其重视人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冲击了神意史观，对后来史学家历史思想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

记史体例方面，我国早在殷商时就有片断的历史纪年，到周武王时已经有了按时间顺序的大事纪年。不过，当时的纪年未能系统保存下来，所以司马迁撰

《史记》时，对包括西周在内的夏、商、周三代，便只能作“世表”，而不能作“年表”。到了西周后期，周王室和各诸侯国的史官记事制度更加完备，文献数量日益增多，历法的使用也更加精密，所以厉王、宣王时便有了按年月顺序的系统记事。根据《史记·周本纪》的资料，自周厉王三十年起，连续发生的厉王拒绝大夫芮良夫进谏、宠信大臣荣夷公、利用卫巫弭谤，直至国人暴动、厉王出奔等一系列大事，都有明确的纪年；而从共和元年（前841）起，一种严格的逐年记事的甲子纪年序列便正式开始了。这表明，至迟从共和元年开始，西周王室以及某些诸侯国已经有了编年体的国史或历史记录。这种编年史体例的记录或许仅是一种朴素而不很系统的历史记录，作为比较完善的历史著作还不成熟，但它无疑是中国传统史学著作的滥觞，是中国传统史学正式产生的先声。

春秋是个大变革的时代，整个社会风雷激荡，大国争霸，权臣执政，文化下移，私学兴起。这种特定的历史环境促进了中国传统史学的正式形成。在当时，史官作为官僚机构中的重要文职，设置更加普遍，上至周王室，下到诸侯国，都无不设有史官，而且史官的名称和种类也比较繁多，如郑国有太史，鲁国有太史、外史，齐国有太史、南史，楚国有左史，晋国有太史、左史等等。不仅周室、诸侯国都有史官，甚至连某些卿大夫家里也设有自己的私家史官，



如：晋国权臣赵盾家有史援，史援曾为赵盾占梦；史黯本是晋国公室的著名史官，后来却投奔到赵简子门下，变成了赵简子的家史。与商朝、西周比较，春秋时期各国史官的职掌更为专业化，即减少了卜筮祈祷的神职活动，增多了记言述事的史职活动。春秋时的史官一般都承担起草文书、记录时政、撰述国史等重任，并负责重要文化典籍与档案资料的整理与收藏。在长期的史职活动中，史官们不断提高自己的修养，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思想意识和记史原则：如在天人关系的认识上，有的史官提出了神“依人而行”的“民本”思想；在记史原则上，不少史官能够忠于职守，秉笔直书，誓死也不歪曲史实，甚至为保卫历史的真实面目而前仆后继地牺牲了自己的生命；还有一些史官博古通今，推往知来，对历史规律提出了许多哲理性的真知灼见。总之，春秋史官所提出的进步思想及其在记录史事过程中体现出的史学精神，促成了当时的一种崭新文化——史官文化的形成。

在史官文化的推动下，大量历史著作涌现春秋舞台。特别是到了春秋末期，一种多以《春秋》为名的新型国史广泛兴起，所谓“百国《春秋》”就是指这种盛况。这些《春秋》具备了“事”、“文”、“义”三个要素。事就是历史内容，文就是史书的书面表达形式，义就是作者的历史观。这类历史著作已经不同于以往史官的史料记载，而是作者在一定历史观的指导

下，采用一定的编撰体例，把历史作为一个过程来系统叙述，在叙述时又不再仅限于本国的事情，而是注重跨出国界兼及其他国家的天下大计，从而也就产生了史学家和史学著作，开创了中国的传统史学。从史官、史料发展到史学家、史学著作是一个巨大的飞跃。二者的主要区别在于，史官只是受职责制约而经管和记录资料，对于自己所经管记载的资料，无论是承袭前人的还是本身记录的，都缺乏足够的研究和整理，没有成为体系的历史思想，所以构不成史学；而史学著作是史学家对历史资料进行整理研究的结果，史学家把历史看做一个过程，在明确的历史观的指导下编纂成书，资料作为整理研究对象而成为历史学说，所以传统史学也就正式地形成了。

中国的传统史学开端于春秋末期，以“百国《春秋》”的出现为标志。就目前文献资料来看，当时可考的史学家只有左丘明。左丘明是鲁国的史官，他在“诗亡然后《春秋》作”的历史背景下，依靠鲁国文化发达、资料丰富的得天独厚条件，编著了两部史学著作《左传》和《国语》。左丘明的这两部著作作为中国传统史学开了先河，启迪和影响了后代史书的编纂，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因此，他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传统史学的创始人。



二 史学大师左丘明

左丘明是春秋末期人，鲁国太史。据相关文献记载，他有着遥远的贵族家世，君子美誉的史官生涯，辉煌的史学著作《左传》和《国语》，并且有相当昌盛的、至今遍布海内外的子孙后裔可考，是一位当之无愧的史学大师。

（一）遥远的贵族家世

左丘明的家世遥远而曲折。他祖出齐地，是周代姜齐开国君吕尚的后人。

吕尚，姓姜，名望，字子牙，因先祖曾封于吕，所以以吕为氏，称吕尚。吕尚本为贵族，后家道衰微，有过一段比较贫穷的日子，传说他卖肉没人问，打工没人雇，年迈才娶妻，又被老婆赶出门。吕尚虽贫，但身怀文韬武略，后来在渭水边垂钓，受到周文王的赏识和重用，被尊为太师，成了周室的军政统

帅，俗称姜太公。姜太公辅佐武王灭掉商朝，建立了周朝的一统天下。他在灭商战争中所展现的杰出军事才能受到世人的高度崇敬，他的兵家策略和奇谋妙计是后代研究和运用的热点，所以后来姜太公在军事史上就成了中国兵家的鼻祖。姜子牙灭商有功，被封于齐，在营丘（今山东临淄）建立都城。他到齐后，因势利导，顺应当地习俗，简便繁文缛节，利用齐国靠海的地理优势，通鱼盐之利，积极发展商业，使齐国很快富强起来，成为西周初期的诸侯大国。在中国民间，有许多关于吕尚的离奇传说，这些传说经明末神话小说《封神演义》的汇总渲染，更使姜子牙成为一个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神奇人物。

吕尚活了一百多岁才去世。吕尚死后，他的嫡子丁公伋（jī）继承爵位，立为诸侯。吕尚有个庶出儿子，名叫印。嫡子丁公伋继承君位后，庶子印依营丘居住，也就改成了丘姓。丁公死后三世，哀公不辰即位。这时，纪国的国君纪侯与哀公关系不和，向周王室进谗言，挑拨哀公和周王的关系，周王一怒之下，烹煮了哀公，而立哀公的弟弟静为诸侯，是为胡公。胡公将国都迁往薄姑（今山东博兴）。哀公有位同母少弟，名叫山。山怨恨胡公即位，组织同党率领营丘的人马攻打胡公，并将胡公杀死。山自立为国君，是为献公。印的后人蒯嘉居住营丘，被迫追随山参与了攻杀胡公的宫廷斗争。尽管山取得胜利，但毕竟是骨



肉相残，背着弑君的丑名。蒯嘉担心会有祸难及身，就离开齐国投奔楚国，在楚国定居下来，并做了楚国的左史官。在当时，官职是家庭世袭的，一代一代做下去，久而久之官名也就成了姓氏，所以古代人往往以官为姓。蒯嘉及其后人世代任楚国的左史，于是便改姓为左，长期在楚国安居乐业，繁衍子孙。

蒯嘉的十二代孙叫倚相，史称“左史倚相”。左史倚相是春秋时期相当著名的杰出史官。自西周建立以来，王室设有多种职掌不同的史官，以协助政务、记录时事、起草公牒、掌管文书，其名称、职责各在不同时期略有变化，到了春秋时天子衰微，王室从前那名目繁杂的诸多史官也就比较简单化，只剩下太史和内史了。可见，太史和内史是周王室内最主要的史官。太史属于朝廷的六卿之一，协助王室处理政务，职掌文事。各诸侯国太史的地位和职责大体也与王室相同。据学者研究，左史就是太史，这样看来左史倚相在楚国是有着较高的政治地位的。倚相博学多才，通于军事，熟悉政治，善于言辞。周景王时，楚君征伐徐国，左史倚相随军出征。一天，楚君在营中召见部下，见倚相恰好路过，便情不自禁地对部下称赞倚相，说：“倚相是位难得的良史，你一定要好好看待他。他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相传《三坟》是三皇时代的书，《五典》是五帝时代的书，《八索》是关于八卦的原始记载，《九丘》则是地